



中国防空部队在越南战场打击美国侵略者



中国铁道兵在越南冒着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抢修铁路

1963—1966 年间中国援助越南

印度支那战争,是指在冷战期间美国为阻止共产党势力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展,从帮助法国到自己直接卷入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的内部冲突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印度支那地区地处中国的西南门户,而美国在当时很长一段时期内又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加之新中国领袖长期以来的革命外交观念,中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态度参与到了这场战争中去,并且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的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当然从 50 年代开始,一直到 70 年代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中国对越南的态度出于种种原因而呈现出忽左忽右的表现,而其中尤以 1963—1966 年间的变化最具代表性。

从 1963 年开始,美国继续扩大对越南的军事卷入与军事干涉,越南共产党及其在它秘密支持下的南越游击战争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对于越南党来说,自身的实力绝对无法支撑与美国之间的对抗,当时可以求助的对象,只有社会主义领袖苏联和身边的邻居中国。此时,苏共的领导人依旧是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后,为了与美国妥协,苏联拒绝公开支持南越和老挝的武装斗争,而且严格限制对越南的军事援助。1964 年 2 月,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率团访问苏联,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对自身革命斗争的支援,可是这次出访非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还由于黎笋在会谈中对苏联过分强调与美国和平共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利以及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等明确表示了不满,苏越双方还发生了冲突。

既然那一时期向苏联求援无望,越南党则更加倾向于向自己北方的邻居加兄弟——中华人民共和国求援。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一直怀着“革命与战争”的强烈理念来指导中国与东南亚共产党的外交。随着 1957 年中苏之间开始围绕“革命与战争”问题产生分歧并不断加剧,毛泽东为了表明中共在继承马列革命思想上的正统性,将中国的外交思想转移到了强调革命与战争上,并开始直接鼓励甚至是援助东南亚地区共产党的国内斗争,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和中共关系非常密切的越南党。到 1960 年为止,中国对越南援助总额达到了 197600 万元,占

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将近三分之一,而随着 1961 年美国对南越实施“特种战争”,即使在国内因为大跃进而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仍然一次就决定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 230 个步兵营的枪炮武器^[1]。相对照苏联党对越南革命的冷淡态度,中共的热情当然进一步使得越南党向中共靠拢,而越南等东南亚共产党都公开站在中共一边,赞成革命,又进一步鼓舞了毛泽东的战斗精神。在 1963 年的 12 月,中国就与越南签订了军事援助的协议,其内容之一就是中国将派遣 30 万军队(5 个步兵师和 5 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来使越南人民军可以抽调力量前往南方与美国作战^[2]。

从 1963 年到 1964 年底,在社会主义正统观念和发动东南亚革命愿望的驱动下,中国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都是以军事、经济上的积极支援为主导。但 1965 年中共中央对地方的一纸批示,却突然与积极援越的外事基调显得多少有那么一点不协调。

1965 年 6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南各局以及国务院各相关部门的复信中,一开头就强调了援越任务的繁重、援助款项的巨大以及战争形势所带来的巨大困难,并提出在一些援助物资上,要越南党先向苏联索取,“如果苏联拒绝,由越南方面正式来函证明,中共再和越方商谈援助的事宜”。而西南地方对越南的援助,只限于“在本省或地方力所能及、财政上亦能平衡的基础上”,给予“农林、水利方面的技术指导,作物畜生等优良品种的供应,农具和机械的革新经验,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培训和少量物资的赠送等”,而其他有关军事、经济、交通建设方面的项目和物资援助,则统一交给中央处理^[3]。

考虑到中苏论战乃至分歧的背景,再看看中国先前援助越南的那番澎湃热情,眼前的这份批示多少有点会让后来人觉得纳闷。中央明显有点“哭穷”的意思,还明令西南地方只能给予越南一些皮毛般的援助。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与苏联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时刻,自认为继承马列主义正统的中共,外交的重点就在于争取共产党国家的支持,此刻又怎么会让自己的兄弟国家去向“苏修”要援助呢?苏

态度的变化 □ 刁含勇

联会不会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而苏联一旦给,越南倾向苏联一边怎么办?

其实,造成上述现象的,正是 1965 年上半年中、苏、越之间关系的改变。

1964 年 10 月,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被他的主席团同事们赶下了台,而代之以勃列日涅夫。勃氏上台伊始,就宣布将给予越南一切必要的援助。而 1965 年 2 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苏方承诺要给予大炮、坦克、导弹等军事援助来加强越南的防御能力。苏联对于援助越南态度的改变,却使得中、苏、越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如果要在中、苏之间作一个选择的话,越南党或许更愿意选择来自苏联的援助,因为苏联才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它所提供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和数量规模都是中国所无法比拟的。当初由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不愿意援助越南,才使得苏越之间产生分歧,而越南则倒向愿意援助自己的中国一边,而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明确表示愿意援助越南,先前双方产生矛盾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越南方面没有理由拒绝苏联的援助。而对于越南党来说,如何在印度支那战场对抗美国才是其最为重要的,对于中苏之间所谓的分歧,越南党方面的态度一直都是暧昧的。越南方面并不太在意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国方面对越南党这种暧昧的态度非常反感,不只一次地批评过越南党的这种调和态度^[4]。

有着这种态度的越南党,之所以选择靠近中国,实在是形势所迫,因为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热衷于同美国的和谈而不愿意援助越南,所以从 1963 年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访华时,就表示了站在中国一边的态度。中国自然也开始大量地给予越南抗战所需要的援助。但是苏联那边关于援助的态度一改变,越南党立即又向苏联那边靠去。但是对于越南党来说,最满意的状况自然是获得来自中国、苏联两个方面的援助,所以 1965 年 4 月,黎笋先是来到中国要求中国派出支援军队进入北越,在获得刘少奇的同意后,又立刻马不停蹄地来到莫斯科,求得苏联保证对其进行支援^[5]。

新乡和平解放的历史探源

□ 王 婧 王 鹏

新乡位于平汉、道清铁路交叉点,是豫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

场上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结束以后,长江以北地区基本获得解放,新乡成为国民党在华北地区负隅顽抗的最后两个据点之一^①。1948年10月上旬,国民党第40军在军长李振清的率领下接防郑州,全权负责郑州及豫北地区的守备任务。当时国民党驻新敌军^②及国民党地方武装^③共计20000余人。

一、新乡守敌陷入“逃跑无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困境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14纵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新乡外围的所有城镇。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东线作战,发起了郑州战役。华北野战军第14纵队在新乡至黄河铁桥间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第40军,使李振清部溃逃新乡。10月22日,郑州、原武、阳武解放,新乡平汉铁路以东各县全部解放;11月7日,与新乡毗邻的获嘉、武陟、焦作、修武也相继解放;11月18日,14纵队在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和冀鲁豫军区第四

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了攻打新乡的路庄战斗,失利后决定暂停攻打新乡,分别在城西南、城北、城东南对新乡县城实施军事围困。1949年2月4日,辉县宣告解放。至此,新乡外围的县城全部获得解放,新乡县城与外界联系的水陆交通被人民解放军彻底切断,新乡成为一座孤岛,驻扎新乡的国民党第40军成了瓮中之鳖。

郑州战役重创国民党第40军,随后的“庞庆振起义”更是震动了豫北国民党各界。庞庆振是第40军首任军长庞炳勋的次子,其率领的316团是第40军的主力团。1949年1月21日,庞庆振偕外出“征粮”之机,率领5000余人在滑县宣布起义。此事大大削弱了第40军的战斗力,造成了基层和中层官兵的军心动摇,也使上层军官的态度有所转变,许多人因此纷纷逃跑投诚。蒋介石对第40军失去了信心,因此不打算增派援兵,命其自行突围。军长李振清在南京晋谒蒋介石返回新乡后,认为大势已去,随即匆匆作了部署,借口腿部枪伤需要治疗,于2月27日离新飞抵武汉,将危



局留给了副军长李辰熙^④。此时,第40军内部已变得军心涣散。

国民党第40军被围困期间,虽然武器弹药充足,工事坚固,但粮草严重匮乏。唯一的粮食增援途径是飞机空投,但大多数空投粮草又都落到了外围我军控制的区域内。与此同时,1949年3月10日夜,第14纵队在新乡西郊的飞机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敌军空中航道也被完全切断了。第40军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组织兵力频繁冒险外出抢粮。遭受抢劫最多的地方是新乡、辉县、获嘉、汲县的农村。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辉县就有124个行政村被抢劫,占全县总行政村的44%,被抢民粮达14万石之多。

二、中共推行“分化瓦解、政策感召、统一战线”的策略

这样的形势变化让中国处于一个矛盾的境地。比起已经“修正”了的苏联,中共认为自己才是马列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是世界“革命”的领袖,凡是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这条正确道路的共产党,都应该站在自己的身边,更何况自己长时间以来给了越南党那么多援助,越南党更应该坚持与中共“一条心”。当勃列日涅夫改变对越南的援助态度后,对于越南党这种两面讨好、两面索要援助的态度,中共打心眼里十分厌恶。但是此时也不可能立即减少对越南的援助,因为这不仅损害中越关系,更可能将越南党完全赶向苏联那怀有阴谋的“怀抱”中。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下,中共一边不断提醒越南党要警惕苏联的“阴谋”,一边还要继续给予越南党援助。这也就出现了上述“中共中央在给西南各局以及国务院各相关部门的复示”中,那段略显矛盾的指示。其实这也就是中共此时对于越南党的态度:如果苏联愿意给你们援助,你们就去拿,我们依然会援助,但不要将我们与苏联相提并论^⑤!

1966年12月20日,国务院向中共中

央作了一次请示,在请示中可以看到,广东、广西在援助越南的时候,提供了成套设备的小型工厂(如糖厂、酒厂、农业机械厂、成套的化验室、水轮泵综合利用站等)、单项机械设备(如柴油抽水机、200千瓦以下的水电站设备、发电机、拖拉机、挖土机、电影放映机等)、交通运输工具(如汽车、救护车、400马力运输船等)、数量较大的作物种子(水稻良种19万斤),而这些都超出了中共中央在1965年6月18日发出的《关于援越问题的复示》文件中所给出的援助范围。国务院对广东、广西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重申了6月18日文件中所规定地方省份对越南的援助范围,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批复^⑥。从这样的批复中可以看到,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在看待地方的对越援助上,是有所保留的,并非是以往所认为的那种“满腔热情”。甚至在1966年下半年,从地方领导人的指示中,依旧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保留”的态度。在该年的6月下旬,越南驻昆明的总领事杨文忠向云南方面提出在1966年给予越南以新援助的问题。而云南

方面的态度则是“现在不考虑新的成批援助”^⑦。此时云南的态度实则也是中共中央从1965年以来援越“犹豫”态度的延续。

综上所述,从1963年到1966年,出于世界革命的信念和中越关系的考虑,中共对越南的援助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热情的,但随着中、苏、越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中苏严重分歧和越南态度暧昧的情况下,中国从国家利益的层面考量,在大规模积极援助越南的行动下,做了一定程度的保留。

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2]Gaiduk.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M].Chicago: Ivan R. Dee,1996.
- [3]中共中央关于援越问题的复示[Z].云南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卷宗号2-1-6084.
- [4]刘少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Z].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所藏档案.
- [5]毛泽东金日成谈话记录[Z].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所藏档案.
- [6]杨奎松.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7]周恩来、邓小平等与黎笋、阮维桢等会谈记录[Z].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所藏档案.
- [8]中共中央关于地方援外问题请示的批复[Z].云南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卷宗号65-2-148.
- [9]云南省人委外事处党组关于援越三省问题的报告[Z].云南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卷宗号127-1-123.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